

跨域视角下的 文化政策研究

A Cultural Policy
Stud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任 珺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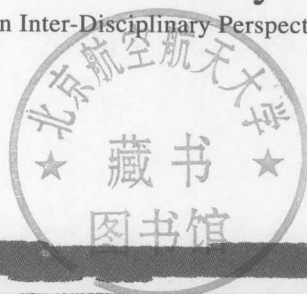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014032930

G0
89

跨域视角下的 文化政策研究

A Cultural Policy
Study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任 珺 / 著



北航

C17212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G0
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任珺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7-5097-5619-5

I. ①跨… II. ①任… III. ①文化工作-方针政策-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6668 号

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

著 者 / 任 珺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项目统筹 / 周映希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周映希 崔 岩

责任校对 / 岳宗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5619-5

定 价 / 59.00 元

印 张 / 18

字 数 / 285 千字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一

彭立勋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多元文化中生活的人们还未能找到一个和平共处的共同秩序。针对全球所面临的这一危机，他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范畴。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说，不仅强调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我们的生活方式、发展道路进行重新思考；而且更要能够既重视自身传统，又能学习他人的优点，为人类创造新的具有时代前瞻性的文化发展模式。他期望中国学术界能够开创学术新风气，着眼于一种宏阔的全球文化视角，而中国学者则能够在社会转型期担当积极的角色。至今，这一命题在理论界和文化实践中仍具有积极的引导意义。而文化战略和政策的选择和实施，正是文化自觉的一种突出体现。

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多变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体现的是个体和群体某种带有自我构建和他者构建特征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精神性的文化存在，更要密切关怀涉及个体或群体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文化实践活动。当文化作为社会管理的新领域出现时，有关文化的规范和管理文化政策就出现了。随之，关系到生产和管理文化产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体制机制也逐步建立起来。这是当代文化政策和文化管理体制产生的背景。利用文化政策作出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对与文化发展相关的社会公私行为进行有选择性的约束和指引，是当今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普遍的选择。任珺的《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一书正是立足于此，开展与当代文化实践紧密结合的文化政策理论问题研究。它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国际、民族国家、城市不同层面文化政策的各个分支领域的发展状况及当今研究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深入探讨。以文



化政策作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在国内学术界还不多见。这一学术研究路径对目前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的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从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的高度提出过关于文化战略的思考。他将文化视为按一定意图对自然或自然物进行转化的人类全部活动的总和。尽管文化表面上呈现出积累的形态，但皮尔森教授所强调的“文化”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文化必须变得更有动态性，更注重未来取向。基于这一认识，他提出文化战略实质是人类的生存战略。冷战后，对主流文化的争夺即国际权力斗争的具体表征。当今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相互交融，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更为深入、更为隐蔽。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内通过文化活动与措施增强国民的文化身份认同及民主实践，对外则通过贸易及传媒行销它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文化价值取向的全局性、总体性的长远谋划，国家文化战略在很多发达国家都很受重视。中国也不能例外。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对我国来说其中最大的突破是对文化的功能有了一种崭新的定位。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提出“文化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评价发展水平、发展质量的指标”。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杭州大会进一步倡议：把文化置于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之中心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处于统领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建设的核心。建设文化强国，实现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不只是为了国际软实力较量，更是中国希望给以世界的独特发展经验。据此，我们更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新的实践，加强对文化的战略研究。任珺的《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一书提出了“建构中国语境下的文化政策研究”，并对此作了积极探索，总结了近年来中国实施文化战略和政策的新经验、新理论、新观点，这是极有价值的。

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发展的推进，城市作为全球战略节点的变化与影响日益重要。城市为文化实践提供了重要的试验场域。对中国城市来说，地方嵌入和联结全球生产网络的过程充斥着传统与现代的抗衡。如何维持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全球性与地方性的平衡，成为城市发展的关键。

世界城市运用文化策略汇集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整合区域软资产，创新性地推动城市功能升级的发展路径，带给我们诸多的启示。未来中国城市治理结构的变革对转变城市政府职能、培育参与城市管理的多元主体、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这三方面内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中国各个试点城市广泛推动的文化体制改革，为地方转型提供了文化领域内的治理经验。政府将从传统的公共文化产品的直接提供者，逐步转变为公共文化管理的宏观协调者。政府在提供基础性的公共文化物品和服务方面仍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其他具体的微观领域，政府则尽可能地退出，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鼓励更多的参与者共同治理。《跨域视角下的文化政策研究》一书在论及文化政策一般性问题的同时，重点关注了国际领域内的“文化治理”与“文化参与”概念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包括政策工具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球比较的视角。实际上，两个概念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与逐步发展起来的文化权利理念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公民文化参与的过程，既是个体文化近用的方式，也是公民自身能力的建构。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个体组成的共同治理结构，也有赖于各方面治理能力的提升。现阶段中国各参与主体治理能力发展是不均衡的，因此，亟待相关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并促进公民文化参与的成熟。这一议题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深圳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深圳的文化建设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迅速迈进。2003年深圳提出实施“文化立市”战略，这是在城市文化战略和政策上的一次大调整，显示这座迅速崛起的经济城市，对文化发展有了更高的自觉。2010年，深圳又进一步提出建设“文化强市”的战略目标，并将这一文化发展目标正式列入深圳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十年来，深圳在城市价值观念建设、文化产品精品创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文化产业发展模式创新等方面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中国提供了城市文化实践的经验。可以说，对于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正确选择和实施，是深圳城市文化这些年来产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选择深圳的探索和实践作为分析文化战略与政策的案例，无疑增加了理论的说服力。当然，深圳城市发展是否能作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典范，乃至在全球发挥影响，还取决于深圳能否一如既往走改革



创新发展之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文化策略可以引导管理者重新回归对人本身的关注。对此，笔者也和本书作者一样对深圳发展充满期待。

任珺在攻读研究生时，就钟情于文化研究。她的硕士论文是研究中国书院审美文化问题的。我有幸参加了她的硕士论文答辩，并应邀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她的论文获得专家一致好评。毕业后她先后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和深圳市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化政策研究，勤奋治学，持之以恒，既深入钻研文化基本理论，又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文化实践，放眼国外文化建设的优秀经验，在公共文化政策和公共文化服务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在，她以此为基础，对文化政策进行了全面、系统研究，既有理论阐发，又有对策建议；既有对已有经验的反思，又有对未来发展的新见，相信这对文化政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会大有裨益。我衷心祝贺这部新作问世，并望她今后不断有新的成果。

2013年12月11日

序 二

吴予敏

不久前收到任珺发给我的她的这本新著全文，我一口气读下来，感到获益良多。

文化政策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涉及面非常广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这部著作，框架系统，逻辑严谨，资料翔实，论述精辟，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领域的丰富的专门知识，同时也对全球文化治理问题、我国文化政策导向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对于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都有很大的启发。

对于社会制度和治理体制不同的国家来说，其制定文化政策的原则和思路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发展要求，其文化政策也有所不同。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制定文化政策主要是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出发。尽管党的八大曾经提出过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阶级斗争的阴影长期覆盖了我国的文化建设，文化创造的多样性、文化传统的保护和继承、对外文化交流的开放性等等，都受制于文化意识形态的总控。这就形成了在文化政策方面优先的思考定式：一涉及文化问题，首先要问哪个阶级的文化，什么立场和导向的文化，为什么人服务的文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了文化的形态和性质。反过来，文化也会对政治经济制度发生影响。但是，文化又有它本身的发展规律，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经济的规律。文化突出的



特点就是它的普适性、共享性和独特性。文化的普适性意味着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制度的约束,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广阔领域中唤起共鸣;文化的共享性意味着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阶级和政治经济纷争,在社会共同体全体成员、全体公民中实现文化创造的公平机会;文化的独特性意味着任何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在于它对于人类文化历史的独特创造与贡献,它也决定了世界上多元共生的文化的和谐环境。马克思主义是对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思想遗产的高度概括和伟大创造,它高度肯定人的自由和人的解放的崇高价值。这一价值理念应当是文化观念的核心的本质的理念,也应当是我们制定文化政策、衡量文化政策的首要的尺度,这一尺度应该高于其他的政策和策略的尺度。当然,这似乎是一种老调重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国家曾经经历过多么令人窒息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时代!文化专制主义也是一种文化政策,在中国有过深厚的历史基础,也会加上类似“文革”那样时髦的现代包装。

我很高兴地看到任珺的这部著作,从头到尾都贯穿了“公民文化权利”的思想红线。我更高兴的是,这些年来,深圳市对这个理念讲得最多,也最为响亮,并且在制定文化政策、实施文化工程层面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建树,切实让人们普遍受惠。凡是有点历史知识的人,或者还没有对共和国的历史淡忘的人,都会充分理解这个理念的内在价值。在这部著作里面,对于文化政策和文化治理的观念的梳理和分析,并没有简单地问“姓社姓资”,而是让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在文化政策方面的不同程度的进步,各国逐渐形成的文化共识,各自从传统和现实出发所制定的文化政策的建设性,以及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将人文主义精神和科学主义精神有机统一。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不能再回到封闭保守的老路。其实老路就是歧路,就是死胡同。只有放眼世界,以开放的、创造的心态,以人的自由解放的基本价值为理想,才能真正融入世界,成为当今世界上积极的文化创造力。文化政策固然也有避免改旗易帜的问题。文化的旗帜,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体现。有什么样的文化认同,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旗帜和文化气质。文化必须在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文化与公民权利的本质契合,是文化认同的牢固根基。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个非常有感召力的政策取向对于我们所从事的文化研究工作，又是新的指引。在研究和制定文化政策方面，我们要将理想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正视我们面临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问題，突出文化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前瞻性、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任务很重，要解决好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好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问题，还任重道远。政府要通过制定科学的文化政策，准确定位市场、社会和政府三方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将更多的发展空间、更多的文化创造的主动权交给市场和社会。我理解这就是在文化创造方面让社会活力竞相迸发，让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的意思。从政府这方面来说，却是要集中力量做市场和社会没有足够能力做好的事情，就是要更多地做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这就是让文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意思。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文化上就要体现在不能单纯地强调文化的产业效益，不要用经济发展的“GDP主义”的指挥棒来指挥文化建设，这和不要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指挥棒来指挥文化建设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国家和各个地区（城市）的文化政策思路越来越成熟和稳定了，这是全体人民之福，也是我们对未来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保持充分信心的一个条件。读了任珺的这本书，我想人们的信心应该更足了。

2013年12月11日



目录

CONTENTS

001	导 言
011	第一章 文化政策研究一般性问题
011	第一节 文化政策：概念界定及政策内容
027	第二节 文化政策研究的一般方法与理论构建
050	第二章 民族国家文化政策
050	第一节 文化观念衍变与文化政策回应
065	第二节 西方文化政策的价值导向及选择路径
076	第三节 中国文化政策发展 20 年
092	第三章 全球文化治理
092	第一节 国际文化政策全球行动
107	第二节 全球治理与公共文化领域实践
119	第三节 城市规划中的地方性文化治理
134	第四章 文化测度：寻求文化发展的标识
134	第一节 文化指标研究：理论与实践
151	第二节 公共文化服务绩效测度



169	第三节 文化参与及文化近用测度
187	第五章 城市文化政策
187	第一节 文化遗产政策
200	第二节 文化艺术政策
215	第三节 文化社会政策
228	第四节 文化经济政策
245	第五节 创意城市：何以发展文化策略？ ——深圳文化立市十年实践（2003～2013）
257	附一 深圳在世界城市及中国大陆城市中的位置
263	参考文献
273	后 记

导 言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世纪之交提出的命题，是指人们要对自身文化有一种自知之明。“知道在新的时代中华文明存在的意义，中华文明要为世界的未来发展做出什么样的贡献。”^①这需要我们不仅要清楚地认识中华文化传统及发展历程，而且能适应新的历史来调整自身文化，从而在文化转型过程中获得新生。当今世界对文化多样性包容与诉求的背后，隐含着未来人类更加激烈的软实力竞争。我们只有对自身文化生命力持有坚定的信念；只有清醒地认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判断和预测未来发展环境；主动担当传承民族文化、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繁荣发展中华文化的历史责任，才能在现代世界多元文化格局中获得民族文化的长久发展。任何一个进步的社会都不可能构筑思想堡垒，阻碍文化交流。未来是否能以开放、通达的心态对待文化沟通与合作，不断革新我们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是我们应对国际竞争成败的关键。

一 当代文化政策的全球发展态势

文化政策概念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久远，现代意义上将其视为民主国家政府的社会文化职能，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出现了许多新

^① 方李莉：《费孝通先生晚年跨越的最后一重山》，《中国文化报》2010年11月26日。



兴的民族国家，它们除了面临政治体制的选择与构建任务之外，还必须考虑政府的政策选择问题，以便更好地维持本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发展。以此为开端，政府利用文化政策对文化发展相关的社会公私行为做出有选择性的约束和指引，是当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普遍做法。文化政策首先在民族国家和国际层面发起。当文化被纳入公共政策领域时，其中文化艺术的独立性大部分都消失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政策的内容范围在不断拓展。从依托精英文化传播普遍价值观，到借助文化功能性和生产性活动，通过文化参与、文化消费使个体满足与社会利益相统一。文化政策不仅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传统及现代艺术的发展，而且公共干预的落脚点更多地放置于文化的社会政策及产业政策领域。随着国际交流日趋频密，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借鉴，文化政策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某种“主流”趋势和同一性。

总体来说，西方国家经历了从传统欧陆模式的现代国家干预和公共赞助，到市场调控转化的潮流。全球化及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发展中国家也程度不一地从各自传统模式中寻求革新之路，以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受国家政体、管理体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所采取的文化政策措施是不尽相同的。但促进社会公正平等、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等目标，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期望，这也是开展国际文化对话与合作的基点。

20世纪80年代始，文化政策开启了从国家视角向城市视角的转换。城市中的社区成为诸多创新性活动的场域。这是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社区生活质量是生活中的决定性因素；社区更贴近个人和社区团体利益，解决种种不易处理的问题。文化图谱（cultural mapping）及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在城市发展中的引入，不只是表面上呈现出的文化资源策略运用问题。它要求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在设计和实施项目时，应将文化因素的分析贯穿于始终。文化的整体性特征（也即综合发展思维）可以促使人们从人类福祉的长远影响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把目光只盯在项目本身的社会成本—收益（经济思维）分析模式上。

文化政策与政治、意识形态存在着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毋庸置疑，

文化政策受一定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观影响,这最终决定公共文化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和文化政策的发展方向。一些国家,如美国,为了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声称国家并无文化政策,奉行尽量不干预的政策。英国一些学者也否认本国存在国家文化政策一说,只承认有区域或城市的文化发展策略。这不足以证明这些国家没有文化政策。事实上,只是隐藏于各项具体政策与措施之中而已。^①有国外学者称这类为“描述性文化政策”(descriptive policy)^②或自由的文化政策。近年来,由于民族国家文化政策内外部环境日益复杂,连美国奥巴马政府也开始修正政策措施,增加对美国艺术基金会的补助,积极推动文化外交。

我国过去一段时间文化艺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特殊经历,使得普通民众对“文化政策”普遍产生误解,认为文化从属于政治,文化政策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关联。尽管这一观念不完全错,但却片面化了文化政策的功能。近30年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文化的独立性逐渐被认知,尤其文化生产力的解放使民众看到了文化的经济力量,以及文化的物的特性。然而国内对文化政策的理解大多还局限于文化政策的狭义定义——文化领域内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③。这与我国主要采纳“指令性文化政策”(prescriptive policy)有关,即以一套事先构思及公布的成文政策来实施。因此,文化政策往往被视为政府的单一行为——监督并实施相关规章制度。随着有限政府的发展、社会建设的完善,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文化政策领域也将日益被重视。文化产品及服务的供给需要扩张到更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考虑,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职责应只限于提供好基本的供应量和质,其他的则交给社会和市场予以补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政策从来就是,而且将一直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中国未来

① 法国学者认为美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州、郡县、市)都在积极但不均等地支持文化和艺术。美国在绝大多数领域都存在对艺术和文化生活的官方和半官方支持,只是比较“分散”而已。〔法〕贝尔纳·古奈(Bernard Gournay)著《反思文化例外论》,李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44~45页。

② 西方学者把民族国家文化政策分为三种类型,即指令性文化政策(prescriptive policy)、描述性文化政策(descriptive policy)及回应性文化政策(reactive policy)。

③ 在我国尤其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报告和中国历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涉及文化的部分。李河、张晓明称之为一切政策中的第一政策(the policy of all policies)。



发展趋势中,社会文化的管理一定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结构。包括不同形式的社群、社会组织等组织化实体及公民个人都应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当然这一过程还亟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与机制予以保障。

进入 21 世纪,文化政策领域分散化,文化政策议题多元化。首先,全球市场的来临及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化,使得文化政策更具广泛的政治意义。民族国家开始加强对文化开发和文化作品内容独创性和民族性的保护性管理;强调民众文化生活的创造性和参与性;从消极的资产保护或展演转移到积极而整体的社会重建。各民族国家纷纷制定文化战略,展开了一场新的全球竞争。其次,文化政策更关注于“文化价值”的“外部利益”,工具化特征明显。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文化本身的目标到底是如何?其中文化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和作用?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国外有学者质疑文化经济的发展,未能实现普遍的文化民主,反而使社会分层加剧,可见市场手段的局限性。再反观早期西欧福利国家在推行文化民主化措施——大力修建文化基础设施、开展文化艺术普及活动时,也是期望公共举措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但调查研究显示:受惠群体也极为有限,并呈固定趋势。政府失灵现象同样存在。对于文化政策未来发展方向,国际社会讨论诸多,主要聚焦于文化与发展关系层面。我认为文化政策需要重返人本主义精神,开启新的文化启蒙。但此时的启蒙方式不再是以往精英式的自上而下传播,而是强调以文化参与的方式——双向流动的过程——培育、增强民众创造能力及治理能力,最终达到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 文化政策研究的新趋势及当代意义

文化政策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与理论研究相比而言,政策研究主要着眼于解决社会实践问题。文化政策研究领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工具性的政策研究和批判性的文化研究。甚至工具性的政策研究也还存在完全不同学科视角的分析框架,这使得文化政策学科内部的学术传统本身就存在着不一致的因素,甚至是对抗的焦点。从学术根源来看,文化政策研究是源于西方知识谱系的学术研究,学科的知识架构不可避免

带有西方学科色彩。当文化政策研究在进行本土化学科建设时,首先脱离不了该领域基本理论及研究方法的运用;其次应注重与中国实践的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加强我们的研究和政策分析能力。英国学者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实践,是生产。文化研究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文化,而是为了实践地改造和建设文化。”这一思想同样可用以描述文化政策研究。无论如何,文化政策研究始终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社会实践的积极介入。

当今文化政策在研究方法上,工具性政策研究路径常采用测绘法(mapping)和比较分析法(comparative analysis)。测绘法主要是运用跨学科知识对文化政策所处的制度背景、社会资源等,作组织、功能和运作系统的综合分析,把研究对象放置在一个宏大的谱系中,关注文化政策过程所置身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环境的影响。比较分析法,通常是共时性的跨区域对比及历时性的历史比较。通过归纳对比研究,有助于理解不同文化政策过程中的共性特征及相异之处;也有助于寻找政策分析规律,提高政策分析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批判性文化研究路径则常采用深度描述法(thick description)和文本分析法(text analysis)。深度描述方法来自于文化人类学,是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种解释性描述。通过把文化政策过程中的研究对象放置于文化系统复杂关系中去观察,以加深对政策行为背景与意义的理解。文本分析法是文化研究常用的方法,这里不再是文学(文献)文本,而是把文化政策实践作为研究文本对象,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阐释其中的结构和象征意义,探寻受众对意义的不同解读方式,揭示文本中所隐藏的意识形态的操纵力量。

目前当代文化政策研究逐步从单一性、简单性,发展到多样性、复杂性,内容更加注重文化整体性、应用性、适应性方面的研究。从文化政策内部研究来看,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仍然是公共政策追求的终极目标。当今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机会平等,普通民众可以平等地参与文化生活,享受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乃至更为广泛地体现在每个个体能在公平竞争中运用知识、创造财富、追求利益的平等,保持社会公正,维护社会的动态平衡。这亟须文化政策研究能够在理论与实践破除文化参与方面物质或非物质性障碍,扩大每个人的文化机会和选择范围。因